

## 清宫履历档案渊源考

刘文华

**内容摘要:**清宫履历档案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主要包括履历片、履历单、履历折。学界已有研究认为,履历档案主要是源自于清代引见制度,故称之为“清代引见履历档案”。实际上,履历片与履历单都与清代引见制度息息相关。履历片是中高级官员的小型人事档案,简明扼要,汇录皇帝历次召见后对官员的评价——朱批记载,以供皇帝简任官员时着重参考。履历片并不保存在军机处,而是可能由皇帝近侍太监(尤其是内奏事处太监的可能性较大)来保存管理,并在内廷保存,严格保密。履历单则是由官员在预备召见时呈递,以供皇帝召见时参考,并且往往经过删改后制作履历片。

**关键词:**清代 履历片 履历单 召见 太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 50000 多件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是清代传记资料宝库,极具史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整理这批档案时,依照其形制,大致区分为履历片、履历单、履历折三类,然后进行细致著录,制作了比较详细的目录。

1997年,这批履历档案影印出版,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以下简称“《履历全编》”),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关于这批档案的形成,《履历全编》“绪言”(以下简称“《绪言》”)部分专门有一节《清代官员引见履历档案的形成与内容》予以介绍<sup>①</sup>,冯尔康也有《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sup>②</sup>一文予以说明,他们都认为这些履历档案是由于清代引见制度而产生的。王志明利用这批履历档

<sup>①</sup>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绪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

<sup>②</sup>冯尔康:《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第13-27页。

案,进行深入研究,成果有专著《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和《清代职官人事研究》<sup>①</sup>。王志明也认为《履历全编》“是清代皇帝引见月选和保举题补官员的履历汇编”<sup>②</sup>,这些履历档案“是由皇帝的私密机构军机处保存的”<sup>③</sup>。

事实真是如此吗?这些形制各异,内容也颇有不同的履历片、履历单、履历折,都是因为引见制度而产生?按照清代制度,引见的主要是中低级官员<sup>④</sup>,高级官员是不需要引见的,但在履历片、履历单中有不少内而中央部院堂官、外而地方督抚的履历档案。这难免让人产生疑问。以下笔者将依据已出版的《履历全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其他相关未刊档案,并结合有关典籍,对履历片、履历单的产生渊源,尤其是它们与召见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有利于学界更好地利用这批档案。至于履历折,笔者赞同它们因引见而产生的观点,就不再赘述。

## 一、履历片

《绪言》认为:“军机处在长期的官员记名、升补活动中,便形成了大量的官员履历片。”<sup>⑤</sup>显然,编者认为履历片是由军机处制作的。王志明也认为:“履历片是由军机处整理的。”<sup>⑥</sup>冯尔康则认为:“履历片究系何人或何衙门所制作,何时上呈于皇帝,何时整理过录,置于宫中何处,对这些问题笔者也不清楚。”对于履历片的产生源流持谨慎态度,仅认定这是“官纂”<sup>⑦</sup>。

对于履历片的形制,冯尔康有具体描述:“履历片则全为白色……由硬纸片作成,长方形,长约六寸半,宽约三寸,有天地头,中间似有铅笔(?)道,区分为六行,用作书写履历,夹行写朱批。天头记录该员的职条变化,如新职、革职,乃至于亡故,地头写地区,天地头不一定每份都有文字。有朱批,如前所述,不一定是一次写的,大部分是过录的,少量是御笔。”<sup>⑧</sup>介绍可谓是相当准确详尽了。不过地头除了“写地区”外,据笔者所见,还有不少写有“侍卫”“题补”之类的文字。“侍卫”表明该官员出身侍卫,“题补”应该表明

①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

②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第11页。

③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第11页。

④黄十庆:《清代的引见制度》,《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第79-86页。

⑤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绪言”,第12页。

⑥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第5页。

⑦冯尔康:《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第18页。

⑧冯尔康:《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第18页。

该官员现职是具题补授的。

一般的履历片中官员履历情况包括以下信息:人名,籍贯旗份(籍贯只写到省份,旗份只写到某旗),年龄,出身,简要任职经历,以及朱批。这些朱批,不管是过录的,还是御笔,其实都是“朱批记载”。所谓朱批记载,是指皇帝在召见、引见官员时,通过“观其体貌情态,听其言语论说,察其人品性格,综合考虑”,做出的简短评价,一般朱笔书写于官员请安折等折件上<sup>①</sup>。

以下结合档案实例分析探讨履历片何时制作,以及其中的朱批记载信息来源等问题。

《履历全编》中有一件乾隆年间刘锡嘏的履历片如下:

刘锡嘏,顺天人,年三十七岁。由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内授职编修,四十年十二月内用山西道监察御史,四十一年十月内调河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八月内用四川学政,四十六年正月内差满回京,本月内用江南河库道。

天头右半部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内用湖北粮道,革职,捐复,发往湖北以道员用,休致。”履历行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内引见,竟可。/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内引见,此人似可用。/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内引见,竟可,好。/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内引见,人巧,着实教道\[导\],去的\[得\]。/乾隆六十三年二月内引见,似可。”<sup>②</sup>

刘锡嘏履历片汇录了多次朱批记载信息,这应该是乾隆帝召见时问询奏对后留下的评价。查阅宫中朱批奏折,刘锡嘏在担任乡试考官、学政,简任道员时曾多次呈递复命折、谢恩请训折,得到了乾隆帝的召见,奏折上亦往往有朱批记载。

刘锡嘏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转庶吉士,乾隆三十六年散馆授编修。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刘锡嘏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广西乡试正、副考官刘锡嘏、戴璐典试完竣,回京上折趋赴宫门复命。乾隆帝召见了他们,并在刘、戴二人名字旁边朱笔评价:“颇可出息,中材。”<sup>③</sup>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御史刘锡嘏(仍留翰林院办事兼四库全书提调)因被简任四川学政,上折谢恩。乾隆帝予以召见,非常赞许,除朱圈

<sup>①</sup>关于“朱批记载”,参见刘文华:《朱批记载考》,《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46-156页。

<sup>②</sup>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第403页。

<sup>③</sup>广西乡试正考官刘锡嘏等,奏报广西科考事竣起程回京日期并校阅试卷数目事,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161-019。本文所用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不再分别注明。

外,还朱笔评价称:“此人竟可,有出息。”<sup>①</sup>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担任四川学政三年期满的刘锡嘏回到京城,趋赴宫门上折复命。乾隆帝召见了,同样画了朱圈,还朱笔评价:“此人竟可用。”<sup>②</sup>(图见封二)回京之后,刘锡嘏转任道员。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新授江南河库道刘锡嘏上折谢恩,乾隆帝召见了,并朱批:“竟可。”<sup>③</sup>二月初七日,刘锡嘏束装起程赴任前上折请训,可能因为刚刚召见不久,乾隆帝就没再召见他<sup>④</sup>。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刘锡嘏调补江苏淮徐道。四十九年,乾隆帝南巡,刘锡嘏因跪迎道左,“得觐天颜”,二月十六日,上折谢恩。乾隆帝又召见了,并朱笔评价:“竟可,好;此人似可用。”还画了朱圈<sup>⑤</sup>。此后,刘锡嘏丁忧去职。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刘锡嘏因服阙来京,补授湖北粮道,上折谢恩。乾隆帝召见了,朱批记载为:“人巧,着实教道\[\导\],去的\[\得\]。”<sup>⑥</sup>后来,刘锡嘏因事降调,在湖南军营效力,捐复原官,奉旨仍以道员发往湖北补用。嘉庆三年(1798)二月初八日,刘锡嘏上折谢恩,太上皇乾隆召见了,并朱笔评价:“似可。”<sup>⑦</sup>

乾隆四十六年年初,乾隆帝原拟将刘锡嘏升用直隶通永道,但刘锡嘏是通州人,经军机处提奏,改用江南河库道,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三十日<sup>⑧</sup>。履历片中提及的“本月内用江南河库道”中的“本月”就是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显然,刘锡嘏的履历片就是在他被简任为江南河库道后制作的。比对刘锡嘏履历片及其所上历次有朱批记载的奏折,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三

①新授四川学政刘锡嘏,奏为奉旨简授四川学政谢恩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056-024。

②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刘锡嘏,奏报交卸四川学政抵京日期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2-0196-009。

③江南河库道刘锡嘏,奏为奉上谕补授河库道谢恩事,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2-0197-072。

④江南河库道刘锡嘏,奏为奉命督学四川任满回京复蒙擢授河库道恭请圣训事,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2-0197-074。

⑤江南分巡淮徐海河务兵备道刘锡嘏,奏为恭逢翠华南幸得觐天颜谢恩事,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070-032。

⑥新授湖北粮道刘锡嘏,奏为新授湖北粮道谢恩事,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2-0222-035。

⑦发往湖北候补道刘锡嘏,奏为奉旨发往湖北候补道谢恩事,嘉庆三年二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2-0255-008。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0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361、364页。

十日刘锡嘏任江南河库道之前,因乡试复命、简任学政谢恩及任满复命三次被召见所奉的朱批记载都没有在履历片中抄录。这恰好侧面印证了刘锡嘏履历片是在其担任江南河库道后被制作的。刘锡嘏任江南河库道后,乾隆四十六、四十九、五十四,嘉庆三年(履历片中记作乾隆六十三年)的五次召见所奉朱批记载都汇录在案。其中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刘锡嘏所上谢恩折中,其名字旁边有两处朱批记载,与惯例不符,令人生疑。这恰好可以从其履历片中得到解释,原来刘锡嘏在该年二月、闰三月两次得到召见,乾隆帝都在同一件奏折上留下了朱批记载。

又如嘉道时期的道员蒋明允,其履历片如下:

蒋明允,湖南人,年三十三岁。由贡生遵豫东例报捐郎中,签分刑部。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内补授本部郎中。二十五年十月内遵续增武陟例加捐道员,在任候选。道光五年二月内用河南河陕汝道。

天头右边:“道光十五年八月内用河南河陕汝道。”天头左边:“故。”履历正文行间:“道光五年二月内引见,平常。/道光十五年八月内引见,外貌可。/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内引见,中等。/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内引见,尚可。”<sup>①</sup>

这四条记录,记载了蒋明允“引见”(实则召见<sup>②</sup>)的时间,及道光帝的朱笔评价。所涉及的四件有道光帝朱批记载的奏折,都在宫中朱批奏折档案中找到了。

据蒋明允奏称,自己嘉庆十九年由贡生遵例报捐郎中,二十年十一月签分刑部河南司行走,二十三年十月学习期满奉旨留部,二十四年补授云南司郎中,二十五年调补浙江司郎中。同年遵例加捐道员,在任候选。道光二年(1822)拣选热河办事司员,前往热河任职。道光四年十一月,签掣河南省河陕汝道。稍后,热河都统以蒋明允办事三年期满,出具考语保奏,请鼓励升用,奉旨“热河办事司员刑部郎中蒋明允现已铨选道员,著即送部引见”。于是,就并案引见。道光五年二月初二日,蒋明允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依拟用”。然后,蒋明允上折谢恩请训称:“闻命之下,感悚难名。伏念河陕汝道统辖三郡,地处冲繁。臣自揣轻材,深惧弗克胜任,惟有吁求恩训,敬谨遵循。于地方应办公事实心实力,矢慎矢勤,以冀稍报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

<sup>①</sup>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第677页。

<sup>②</sup>刘锡嘏、蒋明允的履历中过录朱批记载时,都称为“引见”,但实际上,刘锡嘏、蒋明允都是在道员任上上折谢恩请训,分别得到乾隆帝、道光帝的召见并写下朱笔评价。因此,履历片中记录为“引见”,应该说是不够准确的。这也许跟道府官员一般情况下并无召见资格有关,也有可能是履历片制作人员对引见、召见的区别并不是太清楚。

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道光帝召见了，并在他的职名旁朱批“平常”<sup>①</sup>。

道光九年正月，河南河陕汝道蒋明允因父亲去世丁忧，至十一年四月服阙。但他直到道光十三年才赴京城前往吏部起复候选。他等待了一段时间，在道光十五年七月以应补道员仍铨选得河南河陕汝道。八月初一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河南河陕汝道员缺，著蒋明允补授”。于是，道光十五年八月初三日，蒋明允又以新选河南河陕汝道的身份上折谢恩请训：“臣前膺斯任四载有馀，不敢以熟悉而稍懈黽遑，转恐以因而致滋疏漏。惟有吁求圣训，恪守遵循……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恭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道光帝又召见了，并在他职名旁边朱批“外貌可”<sup>②</sup>。

蒋明允赴任河南河陕汝道后，曾署任了一段时间的河南按察使。至道光二十一年，他已经在河陕汝道任职六年，按例应该俸满引见。于是，蒋明允赶赴京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蒋明允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蒋明允著回任”。五月二十八日，蒋明允奏上回任谢恩请训折，道光帝召见了，并在他职名旁边朱笔写下评价“中等”<sup>③</sup>。道光二十五年，仍任河陕汝道的蒋明允以大计卓异赴京引见，十一月十二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蒋明允准其卓异加一级，仍注册回任候升”。十一月十四日，蒋明允第四次上了谢恩请训折，道光帝召见了，并在其职名旁边朱批“尚可”<sup>④</sup>。

从蒋明允履历片上的履历信息及过录的朱批记载来看，这件履历片显然是在道光五年年初蒋明允奉旨任河陕汝道后制作的。此后蒋明允还三次被道光帝召见，从而产生的三条朱批记载都被过录到其履历片上了。

《绪言》、王志明都认为，履历片是军机处负责制作。王志明还认为：“只是级别较高、职司重要的官员才由军机处备此类档案，这些档案极机密，历代相传，不同皇帝在同一‘履历片’上直抒所见。”<sup>⑤</sup>说履历片档案“极机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认为履历片是由军机处制备，则可能并不准确。

①新选河南河陕汝道蒋明允，奏为奉旨补授河南河陕汝道谢恩事，道光五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33-005。

②新选河南河陕汝道蒋明允，奏为奉旨补授河南河陕汝道谢恩事，道光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54-048。

③河南河陕汝道蒋明允，奏为奉旨回任谢恩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67-068。

④河南河陕汝道蒋明允，奏为奉旨准加一级回任候升谢恩事，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73-032。

⑤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第5页。

乾隆三十九年的太监高云从泄露道府记载案显示,即使是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也不知晓相关朱批记载内容,并以“私向内监高云从探问记载”而被惩处<sup>①</sup>。可见,朱批记载是绝密信息,甚至对军机大臣也严格保密。履历片中有如此多的皇帝朱笔评价或是汇录的朱批记载信息,显然,不应该由军机处制作呈进,更不可能由军机处保管。实际上,这些履历片都在宫中存贮(履历档案属宫中全宗),这也表明了它们不是保存在军机处,而只能由宫内执事人员保管。宫内执事人员,一为宫女,一为太监,而清代宫女一般并不从事政治性活动,相较之下,还是太监的可能性更大。

据乾隆帝说,经管朱批记载的高云从是“写字处下贱太监”<sup>②</sup>,说明高云从是专门从事内廷文书工作的太监。查《国朝宫史》记载,清宫内奏事处“专司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承接题奏事件,随侍御前坐更等事”,共设太监18名,其中内奏事太监4名,随侍太监2名,记档太监4名,使令太监8名<sup>③</sup>。朱批记载主要是在皇帝召见官员之时形成的,内奏事处太监的职责之一就是引带召见官员,那么,保管履历片的可能就是内奏事处记档太监,否则也应是其他近侍太监。不仅如此,这些太监还负责对履历片进行维护,及时添加官员后续的任职、召见等信息,直至致仕或亡故。刘锡嘏、蒋明允履历片的天头及行间的相关信息就是生动的实例。

宫中全宗中有一件乾隆前期的乡试考官考试等第名单档案(图见封二),对理解朱批记载档案与太监之间关系颇有助益。这件名单的官员名字前后有皇帝的圈点及朱笔评价,如“○检讨夏之蓉,江苏进士,鄂尔泰、史贻直保。‘中上’”<sup>④</sup>。“鄂尔泰、史贻直保”指夏之蓉由鄂尔泰、史贻直保举,其中的“○”及“中上”评价均是乾隆帝亲笔。这些官员被保举后,经过考试,区分等第,之后,乾隆帝再召见他们,问询辩难,评定高下,写下评价。这其实是乾隆帝召见候选乡试考官的朱批记载名单。这件档案包封上写着:“乾隆十二年四月十日奉旨交下朱批记载名单一件,外有朱笔黄纸包封纸一件,在尔等处白收贮。钦此。此一件事系随乾隆九年八月初三日交下卷子一事收着,有出派主考时提奏事件,于本日奉旨将卷子交与郑爱贵使纸用,将此一件朱批折单在我等处白收贮。记此。”

包封上文字是何人所写?这从其中提到的“郑爱贵”可以得到答案。据

①刘文华:《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密案档案》,《历史档案》2017年第3期,第30、47页。

②刘文华:《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密案档案》,第30、33页。

③鄂尔泰等编纂:《国朝宫史》下册,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450页。

④呈大学士鄂尔泰等保举中试进士任职名单,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066-001。原著录题名并不准确。

乾隆八年五月初九日上谕：“张照、梁诗正乃国家大臣，郑爱贵竟偏向张照，不足梁诗正，有是理乎！郑爱贵虽未明奏，其面上形色早已难逃朕鉴，若明奏出，朕必立刻将伊正法。今将郑爱贵交与总管太监从重治罪，此系特恩宽典，嗣后务当警戒。总管苏培盛等将郑爱贵议以降一级，再罚一年月银请旨。奉旨依议。”<sup>①</sup>既然是交与总管太监苏培盛处理，可见，郑爱贵也是太监。谕旨还提到“明奏”“面上形色”云云，说明郑爱贵在向乾隆帝当面奏报事务。可能郑爱贵是一名内奏事处太监，常在御前奏报。而且档案包封纸上提到的“卷子（可能是这些官员考试卷子）交郑爱贵使纸用”，既然郑爱贵要“使纸用”，说明他可能常常需要用纸记录信息，从事文书工作。

综上所述可知，这份朱批记载名单是乾隆帝交下太监保管的，根据清代太监执掌，这些太监隶属于内奏事处的可能性较大，否则也应是其他近侍太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包封上提到“出派主考时提奏”，即在清廷任命各省乡试考官时应将此件提示奏呈，作为皇帝钦命考官时的重要参考。实际上，乾隆九年甲辰科乡试各省正副考官，共计16处32人，其中26名乡试考官均出自该名单<sup>②</sup>。因此，可以比较肯定的说，近侍太监在朱批记载档案（有朱批信息的履历片属其中之一）的保管、维护（如及时过录朱批记载、补充官员任职变化等情况）、运用（如适时提奏相关信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翻阅《履历全篇》，笔者发现履历片截止于咸丰年间，同治、光绪、宣统三朝50余年都没有履历片。这是由于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履历片没有保存下来，还是因为同治朝以后就不存在履历片机制了？笔者以为是后者。清代皇帝召见官员，予以朱批记载的机制只是惯例，而且向来保密，并没有成为纸上定制。继位的皇帝可能也只是或由先帝临终前传授，或由近侍太监提示，才“萧规曹随”，照猫画虎。同治帝6岁即位，不能履行皇帝职能，由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代掌最高权力，代行召见官员（同治帝有时也一同召见，但很少发言，只具象征意义）。两宫皇太后文化水平都不高，刚开始垂帘时，也就勉强能读懂奏折，不太具备遣词造句的能力，要在召见官员时边询问边书写朱批记载显然相当勉强。而且，两宫太后似乎也没有这样的意愿，垂帘听政时她们召见的官员人数是少于前面几位皇帝的。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单独召见官员，但一年多后就病逝，并没有恢复召见官员朱批记载的机制。年仅4岁的光绪帝继位，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代掌最高权力。等到光绪十三年（1887），皇帝亲政，单独召见官员，

<sup>①</sup>鄂尔泰等编纂：《国朝宫史》上册，第46页。

<sup>②</sup>乾隆九年甲辰科乡试考官名单根据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1982年，第170-174页。

距离咸丰朝施行朱批记载之制已经 20 多年过去了,旧制已远,就没有恢复。既然朱批记载制已然不存在,以此为基础的履历片当然也就不再制作。

总之,履历片并不保存在军机处,而是由皇帝近侍太监来管理维护。由《履历全编》中收录的履历片来看,乾隆以后,履历片基本是文官外任道府以上时才制作,而绿营武官则一般是副参以上才制作,以总兵居多。履历片与官员被召见息息相关。履历片是中高级官员的小型人事档案,简明扼要,尤其着重汇录皇帝对官员的历次评价——即朱批记载,以供皇帝简任官员时参考。至于制作履历片的素材来源,将在下文讨论。

## 二、履历单

关于履历单,《绪言》认为:“宫中所存的官员履历单,是清朝皇帝在考察、任命官员中形成的文书。”<sup>①</sup>尤其是特简官员。但是又说“现存的宫中官员履历单中,其中一部分便是军机处在办理上述三类高级官员任命、调遣中呈进的”<sup>②</sup>,认为履历单是军机处进单。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晰指明其来源。冯尔康则认为:“宫中档案履历单,包含前述考试履历、考试履历折、引见履历排单、引见履历缺单,还有笔者尚未说到的‘考语清单’、‘清单’。”<sup>③</sup>按他的论断,似乎履历单与履历折颇有重合之处。王志明则并不赞成履历单的分类,他将履历档案主要分为三类,即履历引见折、履历片、履历排单,认为履历单就是“履历片和引见折”<sup>④</sup>。笔者不赞同其观点,履历单与履历片、履历折在形制上有着显著差异,更关键的是,履历单的使用场景、应用缘由,与履历折大不相同。以下就履历单的应用场景及其功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履历单一般没有封面,直接就是正文。履历单中的官员履历非常详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人名,年龄,籍贯旗份(籍贯详细到某省某县,旗份详细到某旗某佐领下人),出身,详细任职、奖励、引见、召见经历。

现存的宫中履历档案是按文种整理的,与其原先的保管单位分离,难以还原原本的使用场景。但是,除了集中保存的宫中履历档案外,宫中朱批奏折中仍有相当多的履历单,基本按原样保存,往往与奏折置放在一起。据此,我们可以知晓履历单的使用场景,即官员在什么时候需要呈递履历单,有何功用。

比如咸丰年间知府朱应元的例子。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十五日,庆

①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绪言”,第9页。

②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绪言”,第10页。

③冯尔康:《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第19页。

④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第5页。

阳府知府朱应元以咸丰九年分大计案内卓异带领引见,奉旨,朱应元著准其卓异加一级,仍注册回任候升。两天之后,十二月十七日,朱应元上折谢恩请训:

兹复蒙恩准其卓异加级,回任候升,闻命自天,感惭无地。伏念六计著尚廉之训,三年隆考绩之文,自顾菲材,何堪驾策。惟有吁求宸训,敬谨遵循。俾回任后得以益矢慎勤,勉图报称,期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sup>①</sup>

折后还有其履历单,单上记载:

朱应元,现年六十四岁,系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由道光六年丙戌科进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咸丰元年六月选补甘肃庆阳府知府……兹以九年大计案内,经陕甘总督觉罗乐斌保荐卓异,于本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准其卓异加一级,仍注册回任候升。<sup>②</sup>

显然,朱应元卓异引见后奉旨获准,于是上折谢恩请训,听候召见。与朱应元奏折一起出现的履历单,记述的也正是其卓异获准前的履历,可见,该履历单是奏折的附件,是预备皇帝召见时阅看的。

在朱应元谢恩请训折的衔名旁边,还有咸丰帝满文朱批“ombi”(“可”的意思),可见朱应元递折请训后,得到咸丰帝的召见,并被写下朱笔评价。

此外,这两件档案后还有一件被命名为“呈甘肃庆阳府知府朱应元引见单”的档案,上面记载:

朱应元,浙江人,年六十四岁。由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以部属用。道光十七年选补刑部主事,二十年补授员外郎,二十四年补授河南道监察御史,俸满截取记名,以繁缺知府用。咸丰元年选补甘肃庆阳府知府。因俸满赴部引见,著准其卓异加一级,仍回任候升。

档案天头右边用朱笔写“咸丰元年六月内选补甘肃庆阳府知府”。档案行间朱笔写“咸丰十年十二月内引见,ombi”。档案最后还有黑笔写的“二等知府”四字<sup>③</sup>。从这件档案的形制和内容来看,它应该是履历片,并且已经移录了咸丰帝召见朱应元时的朱批记载。另外,本卷档案中还有好几份官员

<sup>①</sup>甘肃庆阳府知府朱应元,奏为奉旨准卓异加级仍注册回任谢恩事,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93-001。

<sup>②</sup>呈甘肃庆阳府知府朱应元履历单,咸丰十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93-002。

<sup>③</sup>呈甘肃庆阳府知府朱应元引见单,咸丰十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13-0293-003。题名有误。

请训折、履历单、履历片连续放置的情形,说明朱应元的例子并非孤例。

又比如同治年间道员方濬师的例子。同治七年七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广东雷琼道员缺紧要,著该督抚于通省道员内拣员调补,所遗员缺著方濬师补授。”<sup>①</sup>第二天,方濬师即奏上谢恩请训折,折中称:

伏思广东为紧要之区,道员有监司之责。如臣痔昧,惧弗克胜,惟有仰求宸训,敬谨遵循。俾抵省后于一切事宜,矢慎矢勤,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缮折叩谢天恩。<sup>②</sup>

折后即是其履历单,单上记载:

方濬师,现年三十八岁,系安徽定远县人,由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优贡中式咸丰五年乙卯科顺天乡试举人……同治元年充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六年二月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七年七月十五日奉旨:广东雷琼道所遗员缺著方濬师补授。<sup>③</sup>

同样由方濬师奏折、履历单所记载事情的相关性、语句的关联性,加上档案前后相连,可以确定,方濬师履历单就是在他补授广东雷琼道遗缺,上折谢恩请训时所上,履历单是谢恩请训折的附件,为的是给两宫皇太后召见时参考。

光绪时知府延昌著有《知府须知》,罗列补授知府后应备办的种种事项,其中就有预备召见须注意之事。据《知府须知》记载:“复奏之次日专折谢恩。如系旗员应用清汉折各一件,汉员(引者按:应为“汉字”)履历一件,清汉字膳牌一件。”<sup>④</sup>可见,履历是在京新任知府谢恩请训预备召见时的必备文件。

不仅如此,清宫档案中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光绪前期,皇太后垂帘听政,京内折件一般由军机处先行开列预拟旨意单(称为奏单),上呈皇太后认可后下发各衙门执行。如其中一件奏单内容如下:

十二月十八日

内阁奏明年正月十五日皇上亲政皇太后训政拟请循照旧例停止放事,拟请旨传依议。

……

<sup>①</sup>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sup>②</sup>新授广东雷琼遗缺道方濬师,奏为奉旨补授广东雷琼遗缺道谢恩事,同治七年七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3-0313-028。

<sup>③</sup>呈补授广东雷琼遗缺道方濬师履历单,同治七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3-0313-029。

<sup>④</sup>延昌:《知府须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1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新授安徽按察使张岳年到京请安,拟请旨传知道了,履历留。

锡钧等谢恩,拟请传知道了。

新授安徽凤颍六泗道王廉谢恩,拟请旨传知道了,履历留。

记名副都统富凌阿、桂祥各谢恩,均拟请旨传知道了,履历留。

理藩院郎中宜麟、兵科给事中吴寿龄各伺候召见,呈递履历片,均拟请旨传知道了,履历留。

……①

这件奏单只标明“十二月十八日”,但无年份,但由档案中提到明年皇上亲政、皇太后训政,而光绪帝亲政是在光绪十三年,可知这是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之事。档案表明,理藩院郎中宜麟、兵科给事中吴寿龄伺候召见,呈递了履历。新授安徽按察使张岳年到京请安(实际就是陛见),新授安徽凤颍六泗道王廉谢恩,记名副都统富凌阿、桂祥谢恩,其实都有请求召见之意,而由军机处预拟“履历留”旨意可知,他们都呈递了履历。

因此,通过分析还原档案中履历单的原始状态,辅以官员笔记记载,加上京内折件处理的记录,可以确定,履历单主要是官员预备召见而制作备用的。

官员预备召见,有多种缘由,通过仔细分析《履历全编》中的官员履历单,尤其是履历单末尾的内容,基本可以判断该官员因何被召见(或预备召见),甚至有很多官员履历单上就明确写清楚因何预备召见。以下根据各官员呈递履历单的原因,加以分类叙述。

(一)陛见召见。按例,一般文官按察使以上、绿营总兵以上、八旗副都统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奏请陛见,这些官员或因年班、或因简任新职、或因三年任满等而请求陛见并得到皇帝允许,抵达京城时,就直接趋赴宫门请安,并呈递履历单,听候召见。如甘露,荆州驻防,协领,“(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日接准行知九月十九日内阁钦奉上谕补授西安右翼副都统,钦此。钦遵。即恭折叩谢天恩,奏请陛见,奉到朱批著来见。钦此”<sup>②</sup>。于是,甘露进京陛见,到了京城之后,就趋赴宫门请安,并呈递履历单,请求召见。又如咸丰元年被保举而奉旨来京陛见的浙江布政使汪本荃<sup>③</sup>,光绪六年奉旨来京陛见的

①呈内阁奏明年正月十五日皇上亲政皇太后训政拟请循旧例停止验放事等折拟旨单,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5692-028。档案中称所递履历为“履历片”,这应该是当时的俗称,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业务人员整理时将履历档案区分为履历片、履历单、履历折,主要根据的是档案的形制,故其中称呼有不一致之处。

②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47页。

③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296、297页。

前任九江镇总兵程文炳<sup>①</sup>，及光绪十七年奉旨来京陛见的新任广东琼州镇总兵滕嗣林<sup>②</sup>，都是抵达京城后，即赴宫门请安，呈递履历单，预备召见。

(二)巡幸召见。乾隆帝历次巡幸时都坚持召见地方道府以上官吏，称为“入疆考绩”。乾隆十五年，第一次南巡前昔，乾隆下谕称：“朕临幸各省，道府大员必一一亲询政绩民瘼，其不胜任者，亦在所甄别。或者该抚恐朕责以不能察吏，是以先行奏请，亦未可知，即此足见入疆考绩，裨益良多。”<sup>③</sup>得到召见的道府等官员，亦需呈递履历单。如赵孙英，原是吏部郎中，俸满截取以繁缺道用：“（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吏部遵旨保举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山西冀宁道员缺著赵孙英补授，驰驿前往，钦此。于十一月十二日任事。”<sup>④</sup>由于履历最末已提到任事时间，这件履历单不可能是赵孙英奉旨补授山西冀宁道后请训时所上。那赵孙英的履历单是在何时、在何种情形下呈递的？乾隆二十六年春，皇帝奉皇太后西巡山西五台山<sup>⑤</sup>。乾隆帝巡幸时，山西一省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大员都前往迎驾。赵孙英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呈递了履历单，预备召见的。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赵孙英奉旨升授直隶按察使<sup>⑥</sup>。他上折谢恩并请陛见，折中提到：“于本年二月内台山行在仰觐天颜。”<sup>⑦</sup>可见，乾隆二十六年二月，赵孙英确实在乾隆帝巡幸五台山时被召见，这件履历单就是当时呈递的。可能因为召对时表现良好，赵孙英很快就被擢升了。如山西候补道员程国表<sup>⑧</sup>，同样也应该是在乾隆二十六年皇帝巡幸五台山时，前往行宫迎驾，呈递履历单，预备召见。又如乾隆三十年，浙江新任嘉兴知府高象震<sup>⑨</sup>，在乾隆帝南巡期间，前往宫门谢恩请训，呈递了履历单。再如光绪二十七年的直隶通永道杨士骧<sup>⑩</sup>，当时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銮，杨士骧作为和议人员，随同庆亲王奕劻到保定迎驾，呈递了履历单，以备召见。

①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719、720页。

②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281-283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三七四，乾隆十五年十月庚午，《清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26页。

④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5页。

⑤《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98年，第455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三，乾隆二十六年三月戊辰，《清实录》第17册，第70页。

⑦直隶按察使赵孙英，奏为奉旨升授直隶按察使谢恩并请陛见事，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107-039。

⑧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6页。

⑨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16页。

⑩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562、563页。

(三)谢恩请训召见。清代制度,新任的文官道府以上、绿营武官参将以上(原本绿营总兵以上才有资格,道光时扩大到副将、参将等),如果在京,都须上折谢恩请训,另外,道府官员及副将、参将乃至游击等俸满或得到保举,往往需赴京引见,引见后,皇帝下旨令先回任,回任前这些官员仍应谢恩请训。这都需呈递履历单,听候召见。如程裔采,道光十八年任江苏布政使,因丁父忧回籍,“本年(按道光二十年)起复进京,十二月十三日,奉旨:广西布政使著程裔采补授”<sup>①</sup>。程裔采是布政使,无需引见,可以直接呈请召见,于是他谢恩,并呈递了履历单。不过,当他呈递了履历单之后,又有新的谕旨下来,将他调任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于是,他又呈递了一个新的履历单,这件履历单与前一件履历单字句完全相同,只是在最后增添了一句话:“又奉旨:程裔采著调补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sup>②</sup>程裔采的两件履历单,是官员为谢恩请训召见而呈递履历单的绝佳例证。有关谢恩请训召见呈递履历单预备召见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乾隆十三年新任江南淮徐道高晋<sup>③</sup>,乾隆三十三年被引见而奉旨准补的署理云南元江府知府额鲁礼<sup>④</sup>,道光十九年因被保荐而来京引见奉旨“准其一等注册”的浙江乐清协副将马维衍<sup>⑤</sup>,咸丰元年因伴送琉球国贡使到京而奉旨“伺候召见”的署理泉州府知府王光锸<sup>⑥</sup>,都是例应谢恩请训,呈递了履历单。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不仅召见了额鲁礼,还在其履历单上写下朱笔评价:“□厚,本分人,似结实。”<sup>⑦</sup>

(四)起复召见。清代官员,如果父母等至亲去世,一般应按例辞官丁忧,服满后,须进京起复,听候任用。其中文官按察使以上,武官总兵以上,可以在到京后,趋赴宫门,递折请安,同时呈上履历单,听候召见。如崇福,原是湖南永州镇总兵,道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在任上丁母忧,“回旗守制,十一月十三日,百日服满,具折恭请圣安”<sup>⑧</sup>。崇福因是京城旗人,例需回到京城守制百日,服满之后,身为总兵,可以径直前赴御前恭请圣安,请求召见,于是就递上了这件履历单。又如咸丰元年的原任广东按察使赵长龄<sup>⑨</sup>,光绪

①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37页。

②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37页。

③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1、2页。

④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16、17页。

⑤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39页。

⑥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302页。

⑦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16页。

⑧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41页。

⑨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143、144页。

十八年的前任延绥镇总兵广连<sup>①</sup>，都因丁忧期满起复，赶赴宫门恭请圣安，呈递了履历单，请求召见。

(五)病痊召见。清代官员，如果因身患疾病长期不能理事，就必须先卸职，等到病愈之后，再呈请复职。同样，文官按察使以上、武官总兵以上，有上奏权，他们到达京城后，亦是赶赴宫门，递折请安，也是附呈履历单，听候召见。如兴世，道光十九年二月补授云南临元镇总兵，但因病开缺，并奉旨“俟病痊后著仍以云南临元镇总兵坐补”，“今于本年十二月病痊，遵即恭折趋赴阙廷叩谢天恩，吁请圣训”<sup>②</sup>。兴世的履历单上明确表明他病愈后就“恭折趋赴阙廷”，也就是直接恭请圣安，呈递履历单，请求召见。因为他奉旨仍旧坐补临元镇总兵，于是就谢恩兼请训了。又如咸丰十一年前任西宁镇总兵成明<sup>③</sup>，同治年间的原任安徽布政使张光第<sup>④</sup>，都是因病请假调养，病痊后赶赴宫门恭请圣安，呈递履历单，请求召见。值得注意的是，成明是前往热河行在请安，咸丰帝召见了，并在履历单上朱批“成明著驰驿赴安徽袁甲三军营帮办军务”<sup>⑤</sup>。

以上根据官员履历单中的记载，结合清代召见制度，分析这些官员呈递履历单、预备召见的原因，加以分类，这样能更好分析这些履历单产生的缘由与使用场合。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官员召见，都一定要呈递履历单。

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履历档案中（基本都编入了《履历全编》），履历单一共有8021件，数量相当大，主要是道员、知府的履历，二者之和占比超过一半。具体来说，道员履历单有2283件，知府履历单有2226件。这些履历单，按朝代划分，光绪朝达5800多件，所占比重最大，超过七成。令人诧异的是，《履历全编》中同治朝的履历单仅仅50余件，这并不正常。其原因在于同治时期的很大一部分履历单还保存在宫中朱批奏折档案中，经过大致统计，宫中朱批奏折档案中保存的同治朝履历单约有1400余件。

总之，履历单保存在宫中，是官员预备召见时制作，呈递给皇帝召见时参考备用的。通过分析官员履历单中的记录，往往能判断官员因何被召见，大致何时被召见，从而推断该履历单的比较准确的形成时间。由于是为召见而准备，而有召见资格的一般是中高级官员，因此履历单以中高级官员为主。

①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388、389页。

②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42页。

③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569、570页。

④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568、569页。

⑤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570页。

### 三、履历单的删改与履历片的制作

在《履历全编》中,道光、咸丰时期的很多履历单都有明显的删改痕迹,值得注意。这是谁做的删改,为什么要做这些删改,有何功用?笔者一开始猜想可能是国史馆修撰人员在拟写大臣传记时所做的删改,但这些履历档案保存在宫中,不是一般的国史馆修撰官员可以接触到的,更何况是大规模利用。所以,不可能是国史馆修撰人员对履历单进行了删改。

或许我们可以对比删改前后的履历单,比勘其异同,从而推断其功用。先看道光时副将文惠的例子。

原履历单:

新授福建拣发副将奴才文惠,系镶白旗满洲托恩多布佐领下人,年四十岁。由护军于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具奏委补顶金顶委护军校,嘉庆二十二年二月补放护军校。道光五年六月补放委护军参领,道光九年五月补放副护军参领,道光九年十一月补放随同办事副护军参领,道光十一年四月补放护军参领。

删改后:

文惠,镶白旗满洲人,年四十岁。由护军校道光九年五月内补放副护军参领,十一年四月内补放护军参领,十四年十一月内拣发福建以副将用。<sup>①</sup>

通过对比可知,删改后的文惠履历只有其旗份,而把具体所属佐领内容删除了,其为官履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整体显得简洁明了,并增加了“十四年十一月内拣发福建以副将用”的内容。这表明履历单的删改是在文惠拣发福建以副将用时。另外,删改后的履历把文惠的自称“奴才”二字删除,整体由个人自述式改为了第三人称客观描述式。

再看道光时道员黄恩彤的例子。

原履历单:

黄恩彤,年四十岁,系山东宁阳县人,由道光六年丙戌科进士奉旨以部属用,签分刑部,在安徽司行走。八年派充安徽司主稿,九年兼秋审处行走,是年四月学习期满奏留。十一年充秋审处坐办,随同钦差刑部侍郎特登额等前往直隶查办事件,十二年充律例馆提调。十三年十一月派赴热河都统衙门办事,十六年十二月三年期满经前任都统嵩溥保奏,奉旨:遇有该部主事缺出即行奏补,三月补直隶司主事。十八年

<sup>①</sup>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28页。划线部分为添加内容,下同。

题升直隶司员外郎,随同钦差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汤金钊等前往安徽、浙江、江苏查办事件。十九年六月承审马兰镇拿获放火人犯孙三等一案,奉旨赏加二级。八月充己亥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九月升四川司郎中。本年京察经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王鼎等保列一等引见,奉旨记名以道府用。五月奉命充庚子广西乡试正考官,八月奉旨发往江苏以道员用,本月二十六日奉旨补授江南盐法道。

删改后:

黄恩彤,年四十岁,山东人。进士,以部属用,签分刑部。道光十六年奏补本部主事,十八年题升本部员外郎,十九年八月内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是年九月升授本部郎中。二十年京察保列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八月奉发往江苏以道员用。本年十一月内用补授江南盐法道。<sup>①</sup>

删改后的黄恩彤履历,只有其籍贯省份,把其所属县份删掉了,还删掉了他中进士科分的描述,同样也把个人自述改成了第三人称客观描述(把“系山东宁阳人”中的“系”字删掉了)。对于其任职情况,大为删减,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但对于其中一些容易混淆的年份,又明确标出,显得清晰。如原履历单中说:“本年京察经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王鼎等保列一等引见,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其中的“本年”,如果依据上文,应该是道光十九年,但也可以是黄恩彤书写履历的那一年。对于书写履历的黄恩彤,或者召见他的道光帝来说,这个“本年”的指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召见的那一年。但对于后来的阅读者来说,这个“本年”颇有歧义。同样,履历单中的“本月”的指向,对于阅读者来说,也不知道是具体指哪一个月。而删改后的履历,将“本年”明确为道光二十年,“本月”指明是十一月。

不过,根据黄恩彤的履历单,他在道光二十年八月奉旨发往江苏以道员用后,就应该起身前往江苏省城,十一月补授江南盐法道,应就近接印视事,为何还在京城呈递履历单,谢恩请训,等待皇帝的召见呢(身在外省的新任道员并无资格上折谢恩请训)? 宫中朱批奏折档案中有署名为新授江南盐法道黄恩彤的谢恩请训折,正好可以解释此事。据奏折记载,此时,黄恩彤正担任广西正考官,虽然接阅邸抄,得知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奉旨发往江苏以道员用,但“因未奉部文,仍行回京复命”,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抵京<sup>②</sup>。所以,黄恩彤以广西乡试正考官的身份回京复命,正在他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刚好接到补授江南盐法道的谕旨。于是,黄恩彤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折谢恩(图见封二),同时呈递了前引履历单。道光帝召

<sup>①</sup>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41页。

<sup>②</sup>新授江南盐法道黄恩彤,奏为奉旨补授江南盐法道谢恩请训事,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3-0265-045。

见了黄恩彤,并在其奏折职名旁边写下朱批记载:“甚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黄恩彤履历单的删改笔迹稚嫩拙劣,显然删改者的文化素养不高。而且,删改后的履历“八月奉发往江苏以道员用,本年十一月内用补授江南盐法道”,“八月奉”字后少一“旨”字,“十一月内用补授”中“用”与“补授”两词有重复之嫌,不太通顺。这也显示了删改者文化素养较低。

最后看一下咸丰年间姚锡华的例子。

原履历单:

姚锡华,现年四十五岁,系江苏上元县人。由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进士奉旨以知县即用,签掣山东。二十三年代理新城县知县,二十四年代理长山县知县,兼理新城县知县,二十五年奉准题补安邱县知县,二十八年奏调齐河县知县,三十年奏升曹州府桃源同知。是年经山东巡抚陈庆偕遵旨保奏,奉朱笔圈出交吏部调取引见。兹于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并案引见,奉旨:准其升补山东曹州府桃源同知,著回任。

删改后:

姚锡华,年四十五岁,江苏人。由进士以知县用,签掣山东新城县知县。道光二十五年题补安邱县知县。三十年补升曹州府桃源同知,并保奏。咸丰元年五月内引见,著准其升补山东曹州府桃源同知。<sup>①</sup>

删改后的姚锡华履历,同样去掉了籍贯具体县份,只保留了省份,删掉了“辛丑恩科”,删掉了“系”字,整体上也变成了第三人称客观描述式,任职经历也只保留了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据其履历可知,姚锡华由于被山东巡抚陈庆偕奏保,奉朱笔圈出由吏部调取引见,引见之后,再预备召见,所以才呈递了这件履历单。

综合履历单删改情况来看,删改后的履历单主要包括以下信息:人名,籍贯或旗份(籍贯只写到省份,旗份只写到某旗),年龄,出身,简要任职经历。这正是履历片的基本格式。而且,履历单的删改中往往添加“内”字(以上三份删改的履历片都添加了“内”字),一般是说明在某年某月内任某某官职,亦是履历片的特定常见用语习惯。

删改官员履历单是为了制作官员履历片,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前面已经提到,最晚的官员履历片是在咸丰年间,同治及以后,就不再有履历片档案了。笔者翻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履历单,都没有发现上面有类似的删改痕迹,这恰好侧面印证了删改履历单与履历片的关系。由于同治及以后不再制作官员履历片,就不需要在官员履历单上作删改,因此我们今天所见同治及以后的履历单上面都没有类似的删改痕迹。

<sup>①</sup>秦国经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第300页。

另外,前文还提到咸丰年间知府朱应元的谢恩请训折、履历单、履历片放置在一起的情形,并且,同一卷中类似档案还有多份,这也说明履历单与履历片的相互关系。

至于删改履历单制作履历片的人员,以近侍太监的可能性较大。前文已经提到过,宫中履历片汇录了大量的朱批记载信息,很可能由近侍太监保管运用,而履历单同样保存在宫中,是近侍太监制作履历片最适宜、最方便的底稿。由履历单的删改痕迹可知删改者文化素养不高,这也与太监身份符合。

综上,清代中高级官员的履历单,经过删改制作成为履历片。制作履历片的时间,一般应该就是官员呈递履历单,皇帝召见之后不久。因为如果时间间隔过长,在官员呈递履历单之后隔了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履历单中的“本年”“本月”之类的时间就很难确定是哪一年哪一月了,正如前面删改前后的黄恩彤履历所示。而删改履历单制作履历片的人员,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以近侍太监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这还缺乏非常坚实的佐证,仍需进一步充分挖掘史料深入探讨,再做定讞。

#### 四、结语

清代中央档案一般由一定的政务运作而产生,梳理清楚档案产生的制度背景,无论对于研究相关制度,还是对于考索档案源流,亦或对于运用该档案史料,都有着重要意义。清代中央档案浩如烟海,由于年代久远,且相关记载缺失,其产生缘由与应用场景,往往不太明晰,需要经过努力勾索才能庶几接近当时的历史真实场景。此前学界研究认为,清宫履历档案中的履历片、履历单,与履历折一样,都是由清代引见制度而产生,履历片则由军机处制作。通过探讨履历片、履历单的源流、使用场景,可知它们与清代召见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履历片是清代中高级官员的简明扼要的人事档案,上面往往汇录召见时产生的朱批记载信息,作为皇帝任用中高级官员时的重要参考。履历单是官员因陛见、谢恩请训等而预备召见时呈递,以供皇帝召见时阅看参酌。履历片、履历单都由近侍太监保管运用,删改履历单用于制作履历片,也以近侍太监的可能性较大。履历片尤其被严格保密。明了履历片、履历单的源流,知晓履历片的制作时间、履历单的呈递场景、履历单与履历片的关系等,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运用宫中履历档案,推动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由于履历片、单主要都是因召见而产生,这影响了其官员构成,即主要都是中高级官员档案,这是我们在运用这些档案,尤其是进行清代官员的统计分析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作者简介】刘文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清代档案与历史。

已故淮徐道  
 奉為恭復  
 恩命事竊臣疊輔下士於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內仰  
 蒙  
 皇上天恩簡升四川學政首屆報滿之期新任學臣  
 劉斌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抵成都臣照  
 例將學政關防並一切文冊移交清楚即日赴  
 程於本年正月十二日到京臣謹趨赴  
 宮門恭復  
 恩命謹  
 奏  
 奏為謝  
 恩請  
 訓事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江南鹽法道員缺著黃恩形補授欽此竊臣奉  
 命充廣西正考官出關後接閱邸鈔道光二十年八  
 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黃恩形發往江蘇以道員用欽此臣因奉部  
 文仍行回京復  
 命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抵京謹奉  
 溫綸補授今職除俯副考官臣林揚祖另摺恭復  
 恩命外伏念臣山左下士知識庸愚由道光六年丙

新授江南鹽法道黃恩形跪  
 喜好

黃恩形為奉旨補授江南鹽法道謝恩請訓折

劉錫嘏為四川學政任滿抵京復命折

乾隆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天下硃批記載名單一併外有硃筆書版包封存  
 在爾等處白收貯欽此  
 此冊係乾隆九年八月知旨書卷下卷第百一十卷有硃筆書  
 字跡係奉旨以本冊為本 書冊內字跡與影印本無異故用此冊  
 為記載名單在爾等處白收貯欽此

一 等四名  
 御 史 錢 才 及 江 蘇 進 士  
 御 修 奏 祥 經 江 蘇 進 士  
 御 侍 講 學 士 沈 德 潛 江 蘇 進 士  
 御 吏 部 員 外 郎 戴 章 甫 浙 江 進 士  
 御 修 葉 百 受 蘇 進 士  
 御 請 周 玉 章 浙 江 進 士

二 等十七名  
 御 修 曹 秀 先 江 西 進 士  
 御 講 田 志 勤 直 隸 進 士  
 御 討 周 長 發 浙 江 進 士  
 御 修 朱 益 州 江 蘇 學 為 兩  
 御 史 葛 德 潤 江 西 進 士  
 御 修 何 其 魯 江 西 進 士

三 等  
 御 修 王 承 先 保  
 御 汪 山 教 保  
 御 任 蘭 扶 保  
 御 游 應 祥 保  
 御 薛 宜 光 保  
 御 任 蘭 扶 保  
 御 阿 克 敦 保  
 御 阿 克 敦 保  
 御 任 蘭 扶 保  
 御 阿 克 敦 保

乾隆帝朱批記載名單

詳參劉文華《清宮履歷檔案淵源考》一文